

北京一所公办校刚开学就有12名农民工子女办转学；教学质量高、零收费已不是打工子弟留下的全部理由

转学：往年不离城 如今回老家

流失学生的去向发生变化。因各地中高考政策不一，在京上学难成优势反成障碍

本报讯（记者北梦原）开学刚刚第3周，已经有12个农民工子女来找白老师办理转学手续了。白老师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公办学任教，同时负责学生的书籍管理工作。在这个农民工子女数量占90%的学校里，刚开学就流失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并不少见，但“12个孩子，11个回了老家，只有1个转到通州的小学，这和往年有很大不同。”有老师透露，流失学生去向的变化，反映出更深层的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流失的原因已经发生

了变化。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父母工作的变动曾经是导致这些农民工子女辗转漂泊的主要原因。外来务工者工作的不稳定，使得他们的子女成为一批有着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随到随学、随学随走”。然而，随着农民工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许多家长已经意识到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北京市大黄庄小学校长向记者介绍，“有

的家长去了通州工作，我们学校劝他就近入学，他还是坚持送孩子来我们学校，即使远一点也不介意。”

在城市受教育成本太高也曾是不少农民工头疼的问题，但现在城市里公办小学的零收费政策免去了他们的经济顾虑。“在城市里比农村更省，一分钱不用花。”一位农民工家长对记者说，除了不收费，城市的学校教育质量高、能见到“世面”，这都不是老家能比的。记者走访了两所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的

公办小学发现，学校专门组织成立了农民工子女社团，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的甚至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小学活动；同时，这两所学校在各项教学评比中也位于区县前列。

既然农民工作为家长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城市里的学校又能提供免费和优质的教育，为何仍不断有农民工子女流失？一位小学校长向记者道明了个中原委，“想正经上学，想用知识改变命运，就必须得走。”

记者采访发现，年级越高，流失的孩子越

多。“小学1到3年级，基本不会有孩子走，3年级往后，走的越来越多。”该校长解释说，因为各地中考政策不一，考试标准也不一样，北京的教育很难适合农民工子女，不但不能给这些外来的孩子带来优势，反而可能因为教学内容、进度和教育方式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地方的教育和考试。因此，回老家成为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流失后的最终去向，对教育的重视、更长久的教育计划成为导致农民工子女从城市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合肥：

**建筑业农民工发生工伤
用人单位须垫付医药费**

本报讯（记者陈华）合肥市人社局及市建委日前就建筑业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工伤认定程序以及工伤待遇办理流程等进行了统一规范，自今年9月起，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必须在3日内向工程安监机构报告，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在住院治疗后，所需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因伤情需转诊治疗的，必须由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提出意见，报告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备案批准后可转院。

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或工伤部位旧伤复发，应到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就近抢救治疗，所需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因伤情需转诊治疗的，必须由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提出意见，报告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备案批准后可转院。

发生工伤后，可以申报的待遇有五项，分别为工伤医疗费、辅助器具配置费、伤残补偿待遇、工亡补偿待遇以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据合肥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建筑业农民工工伤保险费费率、工伤保险征缴和赔付等，仍按《合肥市建筑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规定执行。

该负责人同时提醒，关于相关待遇领取，每月22日前，工伤保险中心将医疗费、劳动能力鉴定费转至用人单位。伤残待遇和工亡补偿待遇委托邮政银行社会化发放，农民工可携带单位介绍信就近到邮政储蓄网点领取。

宁夏：

**建设工程领域
清欠再立新规**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处理责任的通知》，对于欠薪顽症开出严格的治理药方。

《通知》有关精神要求，各工程总承包企业必须使用有资质的劳务队伍，落实用工实名制。各施工企业必须与进场施工的农民工依法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设立劳资专管员，每月在施工现场进行工资考勤公示，按月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报备，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

《通知》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因地方政府配套建设资金不到位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从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政府在效能目标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政府主要负责人当年取消评先评优资格，该项目建设单位一年内不得批准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因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该项目引进部门一年内不得被评为先进集体，部门负责人由同级监察或任免机关进行诫勉谈话。

把家安在工地上

王肖峰 何贊

在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武汉管片项目部有一对夫妻，丈夫叫代卫，妻子叫洪光连。他们俩今年都46岁，湖北谷城人，在管片项目部工作有两年多了。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俩这么大的岁数，为什么还有单位愿意聘用？是技术过关，还是有什么“关系”么？

2011年8月，代卫夫妇经同村人介绍来到武汉管片项目部找个工作，代卫被安排在生产线上工作。洪光连因年龄偏大，又没有技术和专长，没有被聘用。失望的洪光连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项目部领导，把家里情况跟项目部领导详细地说了一遍。原来，他们有一双儿女，都很争气，儿子当年考上了大学，女儿读高三，成绩也很好。夫妻俩想出来打工多挣些钱为两个孩子筹学费。项目部领导听完她的介绍，当即拍板让洪光连留下，承担项目上一些杂活，并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夫妻房，夫妻俩感动得热泪盈眶，保证一定好好工作，不辜负领导的关心和照顾。

两年过去了，夫妻俩多次得到项目部领导的表扬，在今年二季度的劳动竞赛中，代卫带领的班组因工作突出取得了优秀奖，获得奖金500元。让人高兴的是，他们的女儿也在2012年考上了大学。每逢节假日，一家四口都会在他们管片项目部的“家”里小聚，享受天伦之乐。

《工人日报》使我
获得工友的信任

■ 韦钦国

在许多人看来，打工就是出苦力，工作地点不是在车间就是在工地，工作环境与脏乱差累联系在一起，而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夏有冷气、冬有暖气的办公室，再加上有时老乡或工友找我帮忙，却因为违背制度而不能办理，所以他们当中不少人对我有误解，经常有意无意地说我风凉话，这让我有点苦恼。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切实地帮助他们一次，也好消除误会。

近两年，工友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对许多内容把握不准。闲杂之余，同事或工友还会就相关热点的维权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遇到把握不准的地方，就去翻看《工人日报》进行确认。由于工作性质，我平时接触和阅读的报纸比较多，因为我有读报的便利，对《工人日报》上那些以案例或讲故事的方式来讲维权常识的报道有很多关注，对常见的一些情况是违法还是合法我基本能辨别。

去年年底，一位工友下工后在回工棚的路上顺路去菜市场买菜，不料被汽车撞伤，我听说后告诉工友们这可以申报工伤。

然而，他们大多本能地认为，这是下班后办私事，是在非工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咋能算是工伤呢，要是这样公司老板不“赔”了嘛，就想与肇事方私了。

我告诉他们，《工人日报》上对此事有过报导与讨论，你们可以去找公司的人事、工会等部门，他们肯定懂，由他们出面来解决比较好，工友们在半信半疑中按我的建议去做了。最后真的被认定为工伤，除了肇事方赔付以外，公司还按工伤的相关规定及时给予了救济，工友及老乡因此事改变了对我的成见，说我“人不坏”，我认为这个评价不低，我很高兴。

青海公路S101线项目部
为务工人员体检

本报讯（特约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谢永彬 舒俊）项目部对我们务工的身体很关心，为预防高原病，项目部医疗队定期为我们进行健康体检和送医送药，我们有了高原上的‘生命卫士’，也就放心了。”日前，中铁五局青海省道S101线B标项目部组织医疗队行程1400多公里，开展了为期14天的健康检查活动，对330名一线施工的务工人员进行了健康体检。

该项目部地处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目前正是高原病易发季节，施工人员很容易患上季节性感冒。对此，项目部通过体检对感冒、肠胃病人员进行了对症治疗，安排4名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体征人员离开了建设工地。

文体活动常驻天津
滨海新区外来工公寓

本报讯（记者姜明 通讯员姜书范）为了让外来工安心工作，今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总工会把近百种学习培训、文体活动等搬进蓝领公寓和建设者之家，让120多万外来建设者可根据需要自行参与，不仅提升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幸福指数，而且推动他们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服务中心不但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而且几乎每周都安排文化娱乐活动，像文艺晚会、露天电影、篮球比赛、礼仪课堂等，都是我们喜欢的文化生活比在老家还要丰富。”22岁的湖北姑娘马丽琴说。

西宁站改工程指挥部
节日慰问农民工

本报讯（特约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罗昌敏 马洪文 杨正培）“企业这个大家庭时刻想着我们农民工，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中铁五局西宁站改工程指挥部开展节日慰问农民工活动，得到了广大农民工的一致好评。

指挥部按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为1000余名农民工送去价值4万余元的牛羊肉、月饼、水果等慰问品；组织开展羽毛球、乒乓球、象棋、扑克等多项文体活动，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家人团聚仍是种“奢侈”

——几名在京务工者的中秋节

本报记者 赵樱泽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本应是吃着月饼，看着晚会，全家人欢聚一堂的日子，而对于漂泊在外的农民工来说，和父母儿女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成了一种奢侈。

放假都是雇主说了算

王美凤今年40岁出头，老家在东北农村，她已经有三年没回家过中秋节了。王美凤是一名家政服务员，大家都叫她王阿姨，在北京一位雇主家里干了两年多，只有春节回过两次老家，加起来不过10天。

“虽然离家不远，但是中秋、端午还有国庆等节日都回不了老家。”对于不能休假的原因，王阿姨说：“现在这家就两个老人住，一天都离不开我。赶上过节，亲戚朋友还会来，我比平时还忙呢。”两位老人都已经80多岁，有一儿一女但都不在老人身边，老人平时的饮食起居都靠王阿姨照顾。“我能不能放假要看老人有没有人照顾。”王阿姨表示，放假都是雇主说了算，“但过节他们都会另给我包个红包，对我挺大方的。”

“中秋节看着别人一家团聚有时候也挺心酸的，

已经习惯独自在外

小陈今年不到30岁，在北京中关村一家美发店当了好几年理发师，“我每周二休息，其他时候都在。”小陈的工作时间每天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上10点，除了中午和晚上的吃饭时间，差不多要忙上一整天。“我现在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儿，挣的钱也够花，我觉得挺好的。”小陈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都挺满足。

小陈用的手机是iPhone4S，穿的衣服也是专卖店买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发型师的门面很重要”，但是提到放假这个话题，小陈也很无奈。小陈老家在安徽，出来打工快10年也没回过几次家，“别说中秋节了，我过春节也两三年才回一次家。有时候就算有假，车票也难买，现在有了动车，但车票太贵了，如果能买到普通票肯定不买动车票。”

“赶上放假顾客多，肯定不能休三天，但调休我能歇

一天。”小陈表示，中秋节那天准备和同事一起吃个饭，晚上再去唱歌。“我中秋节准备给我爸妈寄3000元钱回去，也让老人好好过个节，不过他们肯定不舍得花钱。”说到父母，小陈话多了起来，“平时和他们只能打打电话，他们也不会上网，几年见一次还是很想他们。”小陈停了一下继续说，“不过年轻人就该在外面奋斗，我一人在外这么久也习惯了。”

9岁打工子弟的第一个团圆节

“这是我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中秋节！”李月说起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显得很兴奋。李月今年9岁，在海淀区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上三年级。

李月以前在老家上学，中秋节都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他们年纪大了，不方便带我出去玩，我就白天和同学玩，晚上在家和他们吃月饼。”李月在北京半年多来，由于父母平时工作忙，只带她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大家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和爸爸妈妈去一次长城，妈妈答应我，过节带我去。”对于今年的中秋节，李月充满了期待。

李月的父母在同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爸爸是建筑工，妈妈则帮忙做饭，干些打杂的活儿。这次中秋节爸爸还要上班，妈妈可以休一天假。“放假这天妈妈带我去玩，肯定很累，我要听话，帮她做家务。”李月有些不好意思，说到以后还想去哪里玩，她又滔滔不绝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那首歌里的北海公园，还有颐和园、故宫，我都很想去！”

中秋节 让家人与“影”团聚

9月11日，江苏省常州市，火车站保洁员程桂云在与自己的工作合影。

46岁的程桂云来自安徽太和，保洁员是她来常州的第一份工作，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4年。每逢别人一家团圆的时候，程桂云只能和老公两个人，窝在出租房里烧上两个可口的菜，简单地庆祝一下，每年也只能在春节过后的淡季回一趟老家。今年中秋节，她打算把自己的工作照寄回老家，让父母、儿子与“影”团聚。

吴恺/CFP



农民工为何徘徊在正规劳务市场之外？

赵昂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近日报道，在该省会济南市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正规劳务市场上鲜见农民工身影，他们依旧喜欢在街头的“马路劳务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

山东省是传统的农民工大省，全省农民工有2330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人数的9%左右。济南市劳务市场出现的这一现象并非孤例，大都市里正规劳务市场门票罗雀，马路上的非正规劳务市场却得到农民工热捧，个中缘由究竟何在？

站在农民工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可以得出结论，既然农民工不愿去正规劳务市场，

那么就说明，正规劳务市场难以满足农民工解决其最根本的需求：找工作。

目前，正规劳务市场里的职业介绍机构大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免费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另一类则是收费的社会职业介绍机构。

对于农民工而言，收费的社会职业介绍机构往往不是自己的优先选择，因为这一类职业介绍机构需要收取少额的管理费。尽管费用往往在数十元不等，但是，这些需要依靠职业中介才能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要么是刚来此地打工，缺少社会关系网，囊中也无多少积蓄，要么是没有一定的技术，只能做一些非技术类工种。换言之，这些农民工并不属于那些“月薪超过白领”的“高薪农民工”，管理费用对他们而言依旧是负担。

并且，在正规劳务市场找工作，农民工还要支付一定的“隐形成本”，从居住地往返于劳务市场要花交通费，从劳务市场拿到就业信息再去招工单位一样要花交通费，而一旦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空手而归的话，就将白白耗去一天的时间。而劳务市场里的招工信息往往以招技术类工种居多，门槛较高，不少农民工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既然去正规劳务市场有可能空手而归，还要掏交通费、伙食费和房租，农民工不愿意去正规劳务市场就不难理解了。

即便是免费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与农民工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目前，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往往还承担着为本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以及待业大学生等提供就业帮扶的任务，其所能提供的岗位大多需要一定的知识文化，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外来农民工而言并不适合。

相比于正规劳务市场，街边的“马路劳务市场”赢在了“低门槛”和“短平快”，提供的岗位基本都是零工类，刚进城打工者和无技术的农民工都能胜任，又不用管理费。用工单位开车前来，农民工碰上合适的活儿上车就走，下车就开工，不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高，而且找工作的过程也便捷了许多。

不过，这些“马路劳务市场”一无劳动合

同，二来并不能保障工钱到手，一旦在劳动过程中发生工伤或工资纠纷，将给农民工维权带来很大困难。

因此，有关部门在加强对“马路劳务市场”的整治力度的同时，不妨也吸取一下“马路劳务市场”的一些特点，降低正规劳务市场的门槛，创新服务模式，加强信息沟通。如果农民工能够在正规劳务市场顺利便捷地找到工作，他们还会冒着风险选择缺少劳动保障的“马路劳务市场”么？

【打工路上】